

## 異域、跨界、認同——留學生與中日的近代化

陳瑋芬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 副研究員

### 一、由「師夷之長」到「脫亞入西」

十九世紀中葉，中國與日本經歷了漫長的海禁，彷彿百年沈睡有待甦醒。明太祖為防倭寇而實施海禁，在明、清兩代時張時弛，直到清道光年間（1842）為止，長達四百八十年的期間，中外貿易一直被嚴格限制在少數港口進行。德川幕府一六三九年頒佈的「鎖國令」，只開放長崎對明國和荷蘭貿易，從此自己孤立於世界二百五十年。

大清帝國在鴉片戰爭（1843）的敗戰，驚醒了日本人，佐久間象山（1811-64）提出「東洋道德，西洋藝術」以補日本之不足，主張「以夷之術防夷」<sup>1</sup>。橋本左內（1834-59）也提出：「仁義之道，忠孝之教由吾開。器技之工，藝術之精取於彼。」<sup>2</sup>他們依然推崇儒教道德至上，視西洋技藝為奇技淫巧，無奈地認識到必須「師夷之長以制夷」。而黑船叩關（1853）迫使幕府遷就現實，開始一連串的「安政改革」（1855-60）——向荷蘭商館訂購軍艦、槍砲及軍事書籍，派人學習荷蘭砲術；又成立洋學所、長崎海軍傳習所。各藩也競相學習西洋科技：長州藩採用洋式槍砲、製作洋船、刊行世界地圖，薩摩藩採西洋技術煉鐵、製作電信機、槍砲、農具、蒸汽船，肥前藩製造火砲…。

清廷改革的腳步沈重和緩慢許多，西化政策的舉棋不定。同治年間，保守的滿蒙大員中終於出現了一些有識之士，預見列強堅船利炮對中國的衝擊，希望通過自強，把中國引到「現代化」的道路上。在洋務派的努力下，從十九世紀的六十年代開始，中國的某些城市出現新變化：曾國藩設立安慶軍械所（1861）、李鴻章籌辦上海江南製造局、在南京設立金陵機器局、左宗棠設立福州船政局（1866）、崇厚設立天津機器局（1867）。1867年，福州城南定光寺的古剎裡，飄出幾十名孩子誦念 ABCD 的聲音，這是左宗棠和沈葆楨創辦的福州船政學堂，完全採用西式教育，由法國和英國教習執教，思想家嚴復、海軍將領劉步蟾、鄧世昌、林泰曾，都出自這裡。

可惜古老的書桌並不容易搬動。洋務官員開辦京師同文館，準備由洋教官開設外語、天文、算學等西學內容，招收科舉出身的官員來學習。此議引起軒然大

<sup>1</sup> 佐久間象山：《省響錄》、《日本思想大系》第五十五卷（東京：岩波書店，1976年），頁413。

<sup>2</sup> 《日本思想大系》第五十五卷（東京：岩波書店，1976年）。

波，御史們主張必須以儒家之道培養臣民的氣節，警告同文館「變而從夷」的舉動，將會使中國拱手讓人。

保守派和洋務派之間的拉拒，讓清廷的留學政策搖擺未定。而德川幕府的西化改革雖早，留學管制卻也嚴厲。在制度未開之際，迫不及待打了前鋒的是容闕（1828-1912）和新島襄（1843-90）。他們分別由香港及箱館搭船橫渡重洋抵達美國求學。當時的美國正向外大舉擴張領土，國內南北爭戰頻仍。然而作為「蛇首」<sup>3</sup>的新英格蘭地區人文技術薈萃，在該地林立的數所大學，歷史均超過百年。

容闕於 1854 年獲耶魯文學士學位，是第一位取得美國大學學位的華人<sup>4</sup>，新島襄自安默斯特學院（Amherst College）理學科畢業後，1874 年獲安道佛神學院（Andover Theological Seminary）授與神學碩士學位，是日本留美學生中第一位取得研究所學歷的人。因此人稱容闕為「中國留學生之父」、新島襄為「日本開化史之先覺者」，因為他倆的留學史可以微觀也可以巨視地代表中、日兩國由「師夷長技」到走出國門的歷程。

而日本在新島襄出洋翌年，正式頒佈英、法、荷、葡、美五國的私人留學許可令，公派留學制度也已然整備，與新島襄同期，已有公費留法、留荷、留英者。清廷卻遲遲不能採納容闕官派留學生的建議，他返國後足足 18 年後才促成幼童公費留美的實現，1878 年，第一批官派留學生啟程前往歐洲，之後由於政策的搖擺，留學生出洋時斷時續，直到 1900 年初期，出現大量留日學生。

由日本遣唐使到清末中國學生留日潮，學習的客體和主體，終於逆轉。中國派遣公費生留歐，不僅落後日本整整十六年，就留學國家及學生所學科目而言，也略有不同。中國學生初期除容闕外，所學以醫學、法律、科技、軍事為主，留洋國限於美、英、法、德，後來加上日本。而日本留洋學生所學雖也以實用科技及軍事為主流，卻也有不少學生修習數理化等科學、文學、哲學等等，而留學國除美、英、法、德外，也涵蓋俄國、荷蘭、葡萄牙、普魯士，及少數的中國留學生。

從海禁/鎖國到積極西學，中國和日本都經歷了一段長遠的道路。清朝、德川的官府面對公費派遣學生出歐美留學一事的遲速有異，表徵著十九世紀後期的東洋面對西洋大兵叩關時戒慎恐懼的態度、以及面對西化開放時，欲迎還拒的程度。本文將以「留學生」之主題，選取中日的留美第一人容闕（1828~1912）、新島襄（1843~90），中日的首批公費留英者嚴復（1854~1921）、中村正直（1832~1892），中日以教育家身份留德者蔡元培（1867~1940）、井上哲次郎（1855~1944），中日的第一批自費女留學生津田梅子（1864~1929）、永井繁子（1862~1928）、金雅妹（1864~1934）、何金英（1866~1929）等人的生平、經歷、教育歷程、以及思想內涵，來微觀、巨視地代表中、日兩國由「師夷長技」到走出國門的歷程，為中、日的西化和現代化之路提供一些看法。

<sup>3</sup> 美國國父富蘭克林所繪漫畫，以蛇代表美國早期十三州聯合體，新英格蘭被喻為蛇之首。

<sup>4</sup> 1876 年耶魯主動授與他榮譽法學博士學位。

## 二、私費留美——容閔及新島襄

容閔（原名光照，字達萌，號純甫）出生於廣東南屏村的農家，距離澳門不過五哩，上有兄姐三人，下有一弟。七歲進入郭實臘（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夫人瑪麗在澳門所設的「西塾」，學習英文、算術、圖畫、聖經。他因家貧反而得風氣之先，打開面向西方的眼界。然而 1839 年夏，林則徐到廣州查禁鴉片，中英開戰，學校停課，容閔輟學。1941 年，來自英國的合信醫師（Dr. Benjamin Hobson）受郭實臘夫人所託，領他到香港「馬禮遜學校」<sup>5</sup>復學，課程涵蓋英文寫作、地理、聲樂、幾何、歷史，兼有四書五經。18 歲他闊別家人，隨同鮑留雲牧師（Rev. Samuel Robbin Brown, 1810-79）搭上滿載茶葉的女獵人號（The Huntress），由黃浦江經香港，過好望角，駛向紐約。

當時的美國是個建國七十年的年輕共和國，紐約人口不過三十萬。容閔一行前往康州 Springfield 的孟松中學（Monson Academy），成為該校的第一批中國學生。孟松的課程涵蓋算數、英文文法、生理學和心理學。1949 年，容閔自孟松畢業進了耶魯，兩度拒絕教會資助，在食堂和圖書館打工，賺取生活費。他成績不算突出，但持續刻苦地學習，是「兄弟會」會員，他英文文筆優美，曾經兩次獲得英文寫作首獎。大一，他受了洗、剪長辮蓄西髮、易馬掛著西裝<sup>6</sup>。大二，他接受美籍，加入公理教會。融入西方社會的同時，他也持續關心中國問題，數次在美國報章撰文，所流露的「經國之才」頗受美國人士賞識<sup>7</sup>。他認識到保守專制帶給家園的災難，說：

因為知識增加了，人的道德、考慮的範圍也就廣泛了。我自己想到中國的老百姓這麼樣的痛苦、受那麼大的壓制。我沒有受教育之前，一切都不知道，我就是自己過日子，我接受了教育以後，我覺得這種情況是不能忍受的。我自己現在得到了教育的機會，我就應該使我的同胞，早一點擺脫這種處境，我要為他們服務。<sup>8</sup>

也許是在深思熟慮後意識到，要使中國通過現代化而富強起來，個人的力量何其有限，因此他始終沒有跨入單一學科，而把眼光轉向更多的青年，希望能幫助中國孩子接受西方先進教育。他說：「余之一身，既受此文明之教育，則當使後餘之人，亦享此同等之權利。以西方之學術，灌輸於中國，使中國日趨於文明富強之境。」<sup>9</sup>

1854 年，容閔取得耶魯學士學位（B.A. Degree）。在畢業留言簿裡，他自勉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而他的美國同學期許他道：「我等待聽聞你在未來中國歷史上進行偉大事業的消息。願你回到你的國家時，發現它已成為神聖的

<sup>5</sup> 馬禮遜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開辦的第一所洋學堂，詳見李志剛：《容閔與中國近代化》（台北：正中書局，1981 年）。免學費，學生家境多半貧困。容閔就學六年。（石霓譯注：《容閔自傳》，頁 4）。

<sup>6</sup> 錢鋼、胡勁草：《留美幼童：中國最早的官派留學生》（上海：文匯出版社，2004 年），頁 15。

<sup>7</sup> 石霓：《觀念與悲劇》，頁 58。

<sup>8</sup> 鍾叔河（《走向世界叢書》主編）口述，《幼童·五集電視紀錄片》第一集。

<sup>9</sup> 容閔：《西學東漸記》，頁 27。

共和國。而你將共享參與推翻專制王朝後勝利的喜悅。」<sup>10</sup>

27歲的容闕返抵香港時，幾乎無法以普通話言語，只得一邊學習，一邊積極尋求能餬口的工作。歷任美國駐華代理公使伯駕(Peter Parker)的祕書(廣州)、高等審判廳通譯(香港)、海關翻譯(上海)，最後在上海、九江兩地經商約七年。他數度向洋務大員提及派遣學生留學的議案，未有任何進展。

直到1870年，曾國藩等人在頻繁處理涉外事物的過程中深切感受到，中國由於缺乏懂得處理國際事務的洋務人才，彷彿綁手綁腳。容闕的計畫得到曾國藩的首肯，與李鴻章連合上奏給同治帝。最後清廷決定每年選派幼童30名赴美，四年共計120人，學習軍事、航海、法律和建築工程，使中國人諳熟西人擅長之技，然後可以漸圖自強。學制為15年，幼童出洋的全額費用由政府承擔。但幼童必須遵循受規範的學習領域，且不允許入美籍、永久居留、或追求個人利益而中斷學業。清廷也特別透過康州教育局長請託美籍教師，必須關愛照顧中國學生身體狀況，也須積極督促他們溫習中國功課、激勵他們熱愛國家。幼童在經濟上無匱乏，相對的必須服膺留學事務局的管理——每日必須學習中文、研讀儒家經典，農曆特殊節日需聆聽正副監督宣講《聖諭廣訓》，這個清朝皇帝教導百姓做順民的規章，目的是要示以尊親上之義，庶不至囿於異學。

然而幼童在學業和運動場上均表現優異，長袍長辮影響肢體的伸展，於是開始有人剪辮改西裝，也有人見師長羞於跪叩，或隨寄宿家庭到教堂禮拜。留學事務局監督吳子登嚴格要求學生遵行「諭示」，不服從者勒令退學返國。不過由於幼童思想和舉止西化情況未能有效控制，1881年陳蘭彬不顧容闕反對，奏請清廷將幼童全數遣送回國，容闕亦隨同歸國<sup>11</sup>。

幼童留美計畫表面上受到「腰斬」，內裡卻為中國的現代化產生深重的影響。當整個世界展開工業革命的激烈競爭時，幼童恰好被送到引領這場變化的競技中心。他們在蒸汽機的轟鳴聲中長大成人，平均六年以上美國教育的薰陶，成為一群無法替代的嶄新族群。

容闕在清廷的仕途並不如意，他數度建議實施新政，如聘請外國人擔任外交、財政、海軍、陸軍的顧問，建立國家銀行，修築鐵路等，卻完全不獲採納。他灰心地說：「予救助中國之心，遂亦至此而止矣。」<sup>12</sup>意即，自己透過為清廷效命，改革中國的想法已徹底泯滅。他轉向革新變法，與康有為、梁啟超互動頻繁。戊戌變法失敗後逃離北京。1900年在上海組織「中國議會」，被查緝後再逃往日本，與孫中山同船，之後避居香港，傾心革命派。清廷從未放棄追緝他，1901年他避難至台灣，見台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說：「閣下可隨心所欲，捕予送之中國政府，予亦甚願為中國而死。」偌大中國，竟無立命之地，翌年他懷著眷戀和悲憤，登船赴美，從此永訣故土。

容闕自耶魯返國整整九年後，日本才出現第一位留美學人，而且由於當時尚未開放私人留學令，他必須克服死刑的恐懼違抗幕府禁令，偷渡踏上留學之途。

<sup>10</sup> 《幼童·五集電視紀錄片》第一集，該畢業冊檔案保存於耶魯大學LSF Library。

<sup>11</sup> 在清廷眼中，幼童們既沒有學到多少西方的科技長處，卻已染上「夷族」的「澆風」，一無是處。參見李喜所、劉集林等：《近代中國的留美教育》(天津：天津古籍出版，2000年)。

<sup>12</sup> 容闕：《西學東漸記》，〈自序〉，頁121。

這是新島襄，1843年生於江戶安中藩的武士之家，上有四姐、下有一弟。5歲習書法<sup>13</sup>，10歲入安中藩學問所，跟隨添川廉齋學習漢籍古典，以及劍術、馬術。13歲從藩主之令，隨田島順輔、手塚律藏學習蘭學。14歲擔任安中藩文書輔佐。16歲在安中藩學教授書道，卻一度企圖逸脫武士規範，入蘭學塾求學。此舉遭受藩主責打，他則滔滔闡述了國家危急存亡之秋，必須透過西學知己知彼的信念。19歲入甲賀源吾的洋學塾，20歲開始閱讀日譯《魯賓遜漂流記》、中譯《聯邦志略》、中譯《聖經選錄》，對於與幕藩體制迥異的政體、充分尊重個體自由的社會、以及基督精神，都產生莫大嚮往<sup>14</sup>。

21歲，他由北海道箱館秘密搭乘美籍商船柏林號（The Berlin）前往上海。在航程中自行剃去髮鬚，改蓄西髮。在上海轉搭荒野漫遊號（The Wild Rover）到香港短暫停留。泰勒船長不僅贈送他英譯聖經，尚有一個來自聖經的名字：約書亞（Joseph）<sup>15</sup>。他隨船至東南亞進行貿易，一年後才跨越大西洋抵達波士頓港。在波士頓航員大廈填述的入境理由是「欲讀懂英文聖經，深入認識耶穌基督」。船主哈帝協助他進入麻州安道佛（Andover）的菲利普高中（Phillips Academy）就讀，兩年後畢業，在安道佛神學院附屬教會受洗。升入安默斯特學院理學科，經常在春夏假期進行長途步行，參觀礦山、或遊賞風光。1870年進入安道佛神學院，這是美國最初的神學研究所，嚴守清教教義。研一，他透過駐美公使森有禮的斡旋，獲得日本政府發給的留學許可書，身份上不再是個偷渡者。研二在華盛頓與岩倉具視（1825-83）的外交使節團見面，結識木戶孝允（1833-77）、伊藤博文（1841-1909）等人，兼任翻譯陪同文部理事官田中不二麿（1845-1909）前往視察英、法、德等國的教育制度。返國後受託撰寫《理事功程》初稿，這份報告是為日本近代教育制度的濫觴。1874年取得道學碩士學位，並且在波士頓的弗農教會（Mt.Vernon Church）接受接手禮，成為神職人員。

束裝返國前，他參加在拉特蘭（Rutland）召開的第六十五屆美國外籍傳道人協會（American Board of Commissioners for Foreign Missions），並致信主辦單位，自述傳教意願：

拜啟 請容我敘述我幼少時期所受的教育、基督教的體驗、以及獻身傳教的熱望。我本佛教徒，自幼深受孔子德育的薰陶。及長，前者令我感到不快，而後者讓我感到不滿足。有甚者，我對於良善之物抱持著某種願望，產生這種心情狀態時，我閱讀旅華美籍傳教士所撰寫的聖經歷史（the Bible History）中譯本，獲得撫慰，其中對於神的作為有深入的描寫，引領我冀求神的慈惠。因此我離開祖國，來到異邦。這是神的旨意，祂在波士頓為我準備了熱情的友人，資助我的教育。抵美未久，我便立意成為神的子民，讚美神的話語，求索神之光耀。我希望能把這樣的體驗傳達給我的同胞，讓他們得知神的福音。……<sup>16</sup>

<sup>13</sup> 新島之父在安中藩任祐筆職，並在家開辦書道塾。參見太田雄三：《良心之全身ニ充滿シタル丈夫》，頁14。

<sup>14</sup> 井上勝也：《國家と教育——森有禮と新島襄の比較研究》，頁77-80。

<sup>15</sup> 新島襄在當日（1864年7月11日）的日記上，以英文記載泰勒船長賜名時的話語：I shall call your name Joe. 他由《舊約聖經·創世記》所述約書亞事蹟而自覺神之使命，主動由Joe這個發音而姓名由「敬幹」改為「襄」，激勵他畢生的努力。

<sup>16</sup> 《新島襄全集》六，頁136-137。

這一封信，是新島清楚表白自己由佛教、儒家轉向基督教之心路歷程的重要文獻之一。會議中，他以日本必須設立基督教學校為題演講，一呼百諾，立即得到與會者熱烈迴響以及約五千美金捐款。

1874年，31歲的新島襄由橫濱抵達國門時，見到的是一個被西化風潮席捲的社會。在橫濱矗立著天主教堂，由橫濱到東京新橋之間鋪設了蒸汽火車使用的鐵道，基督教已解禁，西學塾林立。他搭乘維新後才出現街頭的人力車赴安中老家面見雙親，秉告自己以英名 Joseph 擬音更名為「襄」、及奉仕耶和華的決心。在家鄉小學及寺廟巡迴傳教，鄉親迴響熱烈，雙親也信了他的教，把家中的佛教牌位及護符等，全數燒毀。

反倒是新島本人對於母國種種風習，感到強烈的不解與不能習慣。他堅持在食物、器皿、住家樣式、穿著...<sup>17</sup>維持美國風尚。有人認為他不只是在宗教信仰上改信了基督，在文化信仰上也改信了美國。如此對美國文化的偏好，讓他與國內的基督徒間產生嫌隙。即便如此，他仍不停蹄地為創設基督教學校一事而奔走。終於得到京都府顧問山本覺馬贊同，於1875年創設「同志社英學校」，並與山本覺馬之妹山本八重（1845-1932）成婚，這是京都有史以來第一場基督教婚禮。

新島的終極願望，是在日本設立基督教高等學府——「同志社大學」。他寫了封長信給美國外籍傳道人協會，陳述理想的基督教大學是：

一，極盡所能，給予基督教牧師最高等的教育；二，針對基督徒醫師施以完整的教育；第三，設置法學、政治學、經濟學、哲學、歷史、文學等講座，吸引最優秀的學生入學，並接受基督教義的薰陶。<sup>18</sup>

他預備設置神學、醫學、法學等三個學院，並為了培育知識整全的牧師、傳教者，而廣泛地配置各種學系、學科，希望兼顧多元化的學習需要，而招來更多學生，施以基督教的感化。然而由於他身體羸弱，未能看到「同志社大學」成立便於1890年以急性腹膜炎不治，夫人繼承遺志，在1920年創辦了「同志社大學」。

容閔與新島襄接受的美式教育、融入美式生活、接受美式的價值觀，成為在思想上相當西化，卻又可以由宏觀來審思祖國社會需要的人。他們在西方人眼中是徹頭徹尾的愛國者，與傳統文化人卻有所不容。在個人選擇上，兩人對是否改名、是否接受美國籍、是否與西方女子聯姻、以及是否終生傳教等事上頭，做出迥異的判斷，而在教育救國的原則裡，容閔奏議將中國幼童送出國門，遠赴工業革命的競技場鍛鍊和學習，新島則躬身在日本播下基督教的種子，以西方思維教育同胞。他們都支持積極西化，然而對基督教的認知和對祖國民情的認知，導致他們在職業選擇和國家人民之所需等事上，做了相異的判斷。在文化和國家認同上，也表現出強弱與取捨趨向的主觀。他們都著眼於「教育」以「救國」，然而檢視兩人的教育愛國思想，似乎前者比後者對國情抱有更多「同情的憐憫」，因

<sup>17</sup> Isabella L. Bird, *Unbeaten Tracks in Japan: An Account of Travels in the Interior Including Visits to the Aborigines of Yezo and the Shrine of Nikkō*, II (London: J. Murray, 1911), p238.

<sup>18</sup> 《新島襄全集》第十卷。

為入世，所以見聞更貼近社會現實。

這兩位西學所造之子，不僅親身目睹近代中、日的榮辱興衰、國勢消長，也是推動東方西化的內在動力之一。

### 三、公費留英——嚴復及中村敬宇

容閔畢業返國的 1854 年，嚴復(1854-1921)出生在福建省福州的儒醫之家，他在 25 歲那年(1877)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批官派留英學生，也是第一批海軍留學生。而新島襄在弗農教會(Mt. Vernon Church)宣誓服膺神職的 1866 年，德川幕府主動選派 12 名學生前往英國留學，和容閔年齡差不過五指的中村敬宇(1832-1892)，以昌平黌儒官的身份率團遠行。

中村敬宇(幼名釧太郎，後改為敬輔，號敬宇，諱正直，也曾使用過無思散人、無思陳人、無所爭齋等號)，生於江戶麻布丹波谷的幕臣之家。雙親老來得子，對他疼愛非常。3 歲開始學習四書句讀及書法，六歲奉父母之命抄寫《法華經》一百二十行，奉納給本傳寺，以還病癒之願。十歲入昌平坂學問所，接受「素讀吟味」的教育，是最年少的學生。此後學業突飛猛進，並曾得聖堂白銀三枚之賞。15 歲入井部香山門下，井部之學屬折衷學派。16 歲私下向桂川國興學習蘭學，17 歲入昌平坂學問所寄宿寮，修習漢學。當時的昌平坂學問所是日本文教中樞，收羅許多貴重漢籍，敬宇因此在讀書交友方面都蒙此惠，他也珍惜寸陰，志在向學，曾受到當時的儒官佐藤一齋稱譽為模範生。

24 歲(1855)擔任學問所教授，此時持續向桂川甫周習蘭學，向箕作奎吾習英語。1858 年到甲府赴任徽典館學頭。翌年返回江戶擔任御儒者見習，並與高橋鐵子成婚。1862 年升任御儒者，當時碩學名望者眾，以敬宇之年升任御儒者，可謂異例，也足見其秀異。他的學問以朱子學為主，尊崇佐藤一齋，除了洋學外，他向勝安房借來 Lobscheid W. William(羅存德，1822-1893)的《英華辭典(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逐字抄寫，同時也閱讀許多由中國傳來的基督教書籍，對耶穌產生傾慕之情。

1866 年敬宇主動向幕府遞交留英申請，擔任留學團的監督由橫濱出海赴英。他在英國待的時間不長，又因年齡超過倫敦大學規定而終究未正式入學，不過他聘請英人擔任家庭教師，閱讀了不少英國文學文化相關讀物，以及社會科學的著作。返國後任職靜岡學問所一等教授，提出〈敬天愛人說〉，同時著手翻譯事業，1870 年出版了 Samuel Smiles 所著“*Self-Help*”的日譯本《西國立志編》，大賣 100 萬部，與福澤諭吉所譯《勸學篇》並列為暢銷書。對自由民權運動產生莫大激勵。此後他又陸續著手翻譯 John Stuart Mill 所著“*On Liberty*”為《自由之理》，以及 Samuel Smiles 所著“*Character*”為《西洋品行論》等，提倡「最多數人的最大幸福」之功利主義思想，並強調個人的人格尊嚴及自由的

重要性。

1872年他出仕大藏省，致力於女子教育和盲啞教育。他與福澤諭吉、森有禮、西周、加藤弘之等人共同創立明六社，為普及啟蒙思想而努力。這些啟蒙思想家在接受西學之前，長久以來就擅長以「推理判斷」來理解和分析事物萬象。因此對他們而言，西學不能算是異質的學問。他們在學習、理解漢學典籍的過程中，已經練就了理解洋學所必需的判斷力。因此他們在把握西歐著作的理論體系時，並不如我們所想像的困難。所修習過的學問，幾乎都是富於思辨性的思想體系，論證方法也充滿邏輯性，他們善於使用各種「形」將事象概念予以概念化處理。因此他們可以比較容易地把握西歐的文化事象以及作為其根基的哲學，並將這些納入自身的語言體系之中，產生改變國人思維方式的力量。

嚴復（初名體乾、傳初，改名宗光，字又陵，後又易名覆，字幾道），出生於中醫世家。13歲因父親病逝而輟學，放棄科舉「正途」。1866年以第一名考入馬尾船政學堂，5年後以最佳成績畢業，先後在「建威」、「揚武」兩艦實習5年。1877年作為首批海軍留學生入英國皇家海軍學院學習，在英國期間除學習海軍專業外，還精心研讀西方哲學、社會政治學著作，並到英國法庭考察審判過程，作中西異同比較，與郭嵩燾結為忘年交。1879年畢業於格林尼茨皇家海軍學院（The Royal Naval College, Greenwich），返國後獲聘為福州船政學堂後學堂教習。此後被派為北洋水師學堂會辦、總辦，卻因與李鴻章不合，有意退出海軍界，另謀發展。

甲午戰爭（1895）後有感於時事彌艱，開始致力譯著，陸續在天津《直報》發表「論世變之亟」、「原強」、「闢韓」、「救亡決論」等文，斥責歷代帝王是「大盜竊國者」，力主變法維新，極力倡導維新變法以西方科學取代八股文章，抵抗外來侵略。1896年創辦中國最早的俄語學校——俄文館，翌年在天津創辦《國聞報》和《國聞彙編》，更撰寫「上光緒皇帝萬言書」，宣傳變法維新。此時他翻譯的第一部西方社會科學名著《天演論》開始連載並正式出版，科學進化論因此被介紹到中國。此後他有系統地選擇西方的社會學、政治學、政治經濟學、哲學和自然科學著述，翻譯介紹給中國，除了《天演論》外，尚有亞當斯密的《原富》、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約翰穆勒的《群己權界論》、甄克斯的《社會通詮》、孟德斯鳩的《法意》、耶方斯的《名學淺說》、約翰穆勒的《穆勒名學》等，達160多萬字。他的翻譯考究、嚴謹，充滿先秦古風，每個譯稱都經深思熟慮，並提出「信、達、雅」的翻譯標準，對後世的翻譯工作產生深遠影響。他企圖將中國哲學建立在近代科學基礎之上，使中國近代哲學擺脫古代「經學」的形式。他不僅倡導「名學」，又透過《穆勒名學》和《名學淺說》的翻譯，將邏輯歸納法和演繹法介紹到中國。

1900年義和團運動爆發，他避居上海，加入前述由容閔等人發起的「中國議會」，容閔任議長，嚴復任副議長。此後他還傾心於教育事業——1902年受聘為京師大學堂編譯局總辦；1905年參與創辦復旦公學，一度擔任校長；1906年赴任安徽省師範學堂監督；1912年又任京師大學堂總監督，兼文科學長。他在



「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中提出一個比較詳細的學校教育制度藍圖，對於各級學校教學內容和教學方法也有所主張。

1904年嚴復因開平礦務局訴訟事件，前往英國倫敦進行交涉。翌年孫中山由美洲轉往英國，特意去拜訪嚴復，進行了長時間的會談。但辛亥革命後，晚年的嚴復思想日趨保守。1912年袁世凱任臨時大總統時他於翌年被委為總統府外交法律顧問，同年參與發起「孔教會」，極力倡導尊孔讀經。1914年擔任參政院參政及憲法起草委員，1915年擁護袁世凱復辟帝制，列名「籌安會」理事，袁世凱死後，國會要求懲辦籌安會六君子，遂避禍到天津。他嘲笑胡適等新文學革命派是「如春鳥歌蟲，聽其白鳴自止可耳。」五四時期又反對學生運動，批評支持學生運動的蔡元培不識時務。1918年回到福州養病。晚年主要靠譯書為生，1920年因哮喘病久治無效，1921年在福州郎官巷住宅與世長辭，終年69歲。著述有《嚴幾道文集》、《愈懋堂詩集》及《嚴譯名著叢刊》等。

嚴復出生之際，正逢太平軍陷落南京（1853），不絕的內亂招來列強源源的外患。滿清帝國面臨的民族危機，以1856年10月的亞羅號（Arrow）事件<sup>19</sup>為引爆點，從此以後外交政策深受英法兩國的干涉制約，甚至在北京條約（1860）裡將九龍的領主權奉送給英國。而英國的對亞洲的掠奪更張，在1857年引發印度的西帕衣（Shipahi）兵團起義<sup>20</sup>，印度尋求獨立的行動雖然以失敗告終，卻沉重地打擊了英國的殖民統治，並且在英國國內輿論沸騰，迫使英國政府改變統治策略。1858年英國議會通過法案，撤銷東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改編英印軍隊，使其成為英王的直接附庸。

在東印度公司擔任通信審查部長的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認為廢除東印度公司是「把印度的行政權拱手交給英國二三流國會議員謀其私利」<sup>21</sup>的舉動而堅決反對，他撰寫許多書信和請願書企圖改變英國政府的決定，卻徒勞無功。1858年東印度公司結束，彌爾黯然離開自父代（James Mill）以來奉獻了兩代的公司，於翌年（1859）出版了《自由論》（On Liberty）。這部由1854年同名論文改寫而成的著作，後來先後被中日這兩位留英先驅——中村敬宇、嚴復——看中，分別以《自由之理》（1872）、《群己權界論》（1903）的譯名將全書進行翻譯出版，前者在日本大大鼓舞了一八七〇年代中期的自由民權運動，後者在中國雖然不若嚴復其他譯著受到矚目，卻也相當程度地為二十世紀初反對專制倡議自由的知識份子提供了言論基礎。

而比較嚴復和中村敬宇的譯本，會發現嚴復苦心孤詣創造的許多譯語，在現代漢語中絕大多數成了「死語」，反而中村敬宇所創造的新漢語詞彙，在現代日本還普遍被使用的卻不少，甚至反過來在漢字圈裡廣受歡迎。其中原因自然很多

<sup>19</sup> 1856年10月，廣東水師登上懸掛英國國旗的商船亞羅號，緝查走私活動，發現該船在香港註冊的執照已過期，於是拘捕船上十二名中國水手。英國領事巴夏禮向兩廣總督葉名琛抗議，指商船亞羅號曾在香港註冊，受英國保護，要求中國釋放船員和道歉。由於廣州人民憤恨英人所為，故焚毀英國商館。英國於是以英人安全受影響，向清廷宣戰。

<sup>20</sup> 即印度民族起義（The Indian Mutiny），常被視為印度的第一次獨立戰爭。

<sup>21</sup> J. S. Mill: Autobiography (1873)，吳良健、吳衡康譯：《約翰·穆勒自傳》（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

很複雜，嚴復用語的古典晦澀是其一，兩國在跨入二十世紀後教育科學的發展遲速有異是其二，文化傳播的方向是其三。嚴復以「一名之立，旬月踟躕」的態度謹慎對待筆下的譯語，如將 Syllogism 譯為「聯珠、連珠」（日譯「三段論法」）、將 Concept 譯為「意」或「恭什布脫」（日譯「概念」）、將 Philosophy 譯為「斐洛蘇非」（日譯「哲學」），雖然嚴復譯語必有據也極淵雅，但刻意模仿古文，終不能受到大眾接納和使用。反之，日本在明治維新後教育科學迅速發達起來，鴉片戰爭後中國的國力卻日漸羸弱，高等教育機構多數是由列強提供的庚子賠款建立的學校基礎發展而來。政府唯「西風」（也包括「東洋風」）是崇，動員大批具備留日背景的學人翻譯日本出版的啟蒙著作，一方面也希望參考日本學制，迅速完善中國近代教育機構。在這些譯著裡使用大量的日本漢語詞。由數量上對比，嚴復煞費苦心的造語沒辦法取得社會和教育方面的重視，不久也就銷聲匿跡。

可以說，嚴復的譯語被來勢洶洶的日本新漢語詞彙「吞噬」了，作為漢字母國的中國，在這段時間反過來輸入大量日本詞彙，在文化生活和日常生活裡通用、流行起來。

#### 四、教育家留德——蔡元培及井上哲次郎

比較起英、美兩國，中、日的歐陸留學生在早期出現得稍晚，人數也較少。1866年德川幕府頒佈英、法、荷、葡、美五國留學許可後，先後有馬島濟治、赤星研造赴德國習醫<sup>22</sup>，1870年代以後開始出現為數稍多的留德者。清政府在二十世紀初才開始對歐陸派出留學生，1903年京師大學堂選派16位留歐學生，陸師學堂、湖北各學堂也選派學生數名赴德習陸軍等。1894年以東京大學副教授身份奉派留德的井上哲次郎（1855~1944），以及1907年以中國教育會會長、愛國女學校長身份赴德留學的蔡元培（1867~1940），都算是中日留德史中的前輩。

井上哲次郎（字巽軒），誕生於九州太宰府的醫師家庭。他幼年時正當蘭學的全盛期，有機會在傳統漢學私塾與新式洋學塾接受四書五經及英語教育。中學時期又逢維新時期變更學制，遂前往長崎的「廣運館」接受新制西式教育，習得優異的外語能力。畢業後獲選進入東京著名的高中「開成學校」，以兩年時間修完了三年的課程，考入東京大學，成為新設「史學哲學政治學科」的第一屆學生，主修哲學、輔修政治。

可以說，井上的求學歷程都正好搭上逢維政府西化政策的列車，憑藉家境的經援與本身充實的學力，一帆風順地接受當時最新潮的教育。東大畢業後，他隨即獲聘為母校新設立的「古典講習科」副教授，主授「東洋哲學史」，在教學活

<sup>22</sup> 荒木康彦：《近代日獨交涉史研究序說——最初のドイツ大學日本人學生馬島濟治とカール・レーマン》（東京：雄松堂出版）。

動中為實踐儒學的近代化而努力。東大畢業後，於 1894 年奉派留德，於 1890 年回國，直接升任東大「哲學科」的首位日籍教授，之後在日本哲學界居領導地位，歷任東大文學院院長、「哲學會」會長、大東文化學院校長等職。他致力將德國的觀念論哲學傳入日本，奠定了日後日本學術哲學的特色。井上擔任當時新成立的東洋哲學講座（1892），指導學子們重新架構東洋思想使之成為近代性哲學、哲學史（印度哲學史、支那哲學史），將日本的近世儒學重新架構成日本哲學，整理成《日本朱子學派の哲學》、《日本陽明學派の哲學》、《日本古學派の哲學》等三部著述。此外受命於政府勘訂教育敕語之意義整理成《敕語衍義》（1891）奠定了修身教育之基礎。甚而藉由國民道德論提供日本教育界國民道德之指導理念。

在東大任教時期，他特別關心「東洋」和「倫理」的議題，也是維新後第一位正式在學術場域提出「東洋」論的學者，「東洋」是「西洋」的對話，意指以中國、印度為主的學問。他主張必須建立東洋自身的哲學體系，重視其「宗教」和「倫理」史實，深入比較東西方思想。由於東洋思想本身所具備的哲學性尚未被充分彰顯，因此可以參照西方哲學，將之理論化，提升其思想價值。

他撰寫《倫理新說》<sup>23</sup>，這雖非倫理的新創，卻是他自覺地從理論上探討「倫理的根本」，根據歐洲倫理學（Ethics）的問題架構，在近代日本組成新「倫理學問題」的學術論述。他主張「倫理之根源」是來自「道理上」的，由於倫理是一種實踐性的理則，也是一種向社會大眾宣說的指標，所以必須考究其理論根源。他所主張的倫理學（Ethics）結構，是關於人類終極之「善」性的倫理學。而「倫理學」與「物理學」、「政治學」、「心理學」、「理財學」、「法理學」<sup>24</sup>等學科一樣，都是明治時期出現的新興學科，它們區分了學術範疇，重組新的學術史。

留德返日後他率先倡導「東洋倫理學」，即一種融合中國、印度、日本三個文化的東洋倫理體系。他以「倫理」和「道德」來區分西洋和東洋的價值傾向，企圖融合西洋倫理和東洋道德：

**西洋倫理以知識的探求為主，不重視心德的磨練。換言之，道德思想必須先經過知性的求索，才能付諸實踐。二者合一，不可偏廢。若能結合東西洋道德之長，古今未曾有的偉大道德必將出現。<sup>25</sup>**

他試圖在東方傳統思想中，尋找能夠與西歐倫理學說相對應的內容，作為自我對「西洋倫理，東洋道德」的實踐。

蔡元培（字鶴卿、仲申、民友、子民，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浙江紹興山陽縣人，從小接受的是傳統儒學教育。光緒年間，他 17 歲先中舉人，25 歲點翰林，1894 年授翰林院編修。戊戌變法失敗後，他所崇拜的譚嗣同遭清政府殺害，

<sup>23</sup> 《倫理新說》（東京：同盟書肆，1883 年）收錄於吉野作造主編：《明治文化全集》第 23 卷思想篇（東京：日本評論社，1928-1930）。

<sup>24</sup> 在此列舉之學科名稱和「倫理學」都是《哲學字彙》（1881 年修訂版）序言所列學科分類。

<sup>25</sup> 井上哲次郎：《日本陽明學派之哲學》，頁 578。

令他深感清廷政治改革「無可希望」，斷然離開翰林院南下，擔任紹興中西學堂監督，提倡新學。

1902年，他在上海與章炳麟等發起成立中國教育學會，擔任會長，同年秋又創立愛國學社和愛國女學，創辦《俄事警聞》（後改名《警鐘日報》），提倡民權，鼓吹革命。1904年，與龔寶誼等人在上海建立光復會，密謀武裝起義，翌年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後，擔任南京臨時政府教育總長，主張教育的目的在於締造現世的幸福，反對讀經，模仿西式教育制度。

1907年因不滿袁世凱專政而辭職，旅居德、法，進行教育、哲學和美學的研究。1915年與李石曾等人合組留法勤工儉學、與吳玉章等人合組華法教育會。1916年回國，次年擔任北京大學校長，着手改革北京大學，改革北大體制、設立新學科和研究機構，提倡平民教育，實施男女同校。他採取「兼容並包」的方針，不拘一格招聘眾家，一方面聘請陳獨秀、魯迅、胡適等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當教師，另一方面又續用辜鴻銘等舊派人物，北大校園一時間人才匯聚，百家爭鳴，成為了新文化運動的搖籃。令北大不僅成為全國學術研究重心，校園裡也洋溢著熱衷於學術研究、思想自由的氣氛。

蔡元培校長又支持日益興盛的新文化運動，提倡白話文，贊成文學革命，反對封建復古，倡導以科學和民主為內容的新思潮。他的努力終使北大成為「五四」時期新文化運動的中心。不過由於他在運動中支持學生，1923年被迫辭職出走歐洲。1926年回國後，參與國民革命軍北伐，翌年倡議成立大學院作為全國最高學術教育行政機關，被任命為大學院院長，後改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他晚年致力於抗日救國。1932年與宋慶齡等人在上海組織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被推選為副主席。1937年經香港轉赴重慶，由於路途遙遠，加上體弱多病，於是決定暫留香港休養。其後因得知愛女蔡威廉在昆明因分娩感染病菌猝逝，深受打擊，病情急轉直下。1940年在寓所失足跌倒，陷入昏迷，送院救治無效而病逝，享年73歲。

和井上哲次郎的嘗試很類似，蔡元培也十分關注倫理學方法的運用，不遺餘力地譯介和傳播西方倫理學。他早年留德國期間特別重視對西方倫理學的學習和研究，摘譯了包爾生的《倫理學原理》。這部書的翻譯體現出蔡元培對在中國建立規範倫理學的主動態度和迫切感。他的譯介把新康德主義倫理學的基本方法介紹和傳播出來，同時比較了義務論和功利論的得失，為中國近代倫理學的建構和發展提供了一個選擇。

此外他又非常注重中西倫理學的比較，自覺地把這種規範方法運用到中國倫理學史的研究當中。他對西方倫理學方法有相當的自覺，在肯定西方倫理學方法研究開拓性的同時，也自覺到傳統上習慣於將社會行動和一般價值問題泛道德化，如此會帶來倫理學研究的不足。因此他撰寫《中國倫理學史》，自覺地運用西方規範倫理學方法，勾勒出中國倫理學史的概要，以敏銳的思維，對中國傳統倫理思想進行客觀、辯證的分析，十分難能可貴。

## 五、最早的女留學生——津田梅子、永井繁子、金雅妹、何金英

像容閔所推動的第一批公費留美學生——留美幼童般，以年僅十歲或十來歲的年紀就出洋留學，在近代日本也不鮮見。如 1865 年幕府派往荷蘭的留學生就有 13 歲的小澤清次郎、15 歲的田中次郎；1866 年幕府派往英國的留學生中就有年僅 12 歲的菊池大麓；而 1871 年，明治政府派遣 5 名少女留學生<sup>26</sup>——吉益亮子（16 歲）、上田悌子（16 歲）、山川舍松（12 歲）、永井繁子（10 歲）、津田梅子（9 歲）隨同岩倉使節團赴美留學，也屬於幼童留學。

明治維新後，由於文明開化運動的影響和西方文化的傳入，使人們認識到進行女子教育、提高母親素質的重要性。津田梅子、永井繁子等人赴美留學翌年，文部省發布《學制》時也明確指出：「開人子學問之端緒，使其明辨事理，多在於母親教育之力，故一般說來，其子之才不才要在其母之賢不賢。」啟蒙思想家批判傳統儒家女子道德，提倡與男子平權的西歐知性婦女形象，作為日本婦女追求的任務。

1875 年，前述中村敬宇在《明六雜誌》上發表〈造就善良的母親說〉一文指出：「子女的精神心術大體與其母親相似，連後來的嗜好癖習也多似母親。人民改變情態風俗進入開明之域必須造就善良的母親，只有絕好的母親，才有絕好的子女」<sup>27</sup>，而文部大臣森有禮更強調振興女子教育的重要性，指出「國家富強的根本在教育，教育的根本在女子教育，女子教育的發達與否與國家安危有著直接的關係」<sup>28</sup>。可以說，中村正直的「造就善良的母親說」及森有禮的培養「良妻」和「賢母」的女子教育觀，成為日本近代新的女性觀——「良妻賢母論」的起源。由封建時代視婦女為「借腹之物」到近代的「教育母親」，可見出日本女性觀的明顯變化。

最初公費留美 5 名少女中，是明治政府公開招募而來。檢視其出身檔案，可以發現他們的雙親都來自在倒幕維新過程中，那些被視為「賊軍」的藩國。也許是政治的不如意，加上文化上不屈不撓的意志，促使他們的父母期待女兒出洋學成後，能求得社會、經濟層面的自立，於是破天荒下決心將她們送往「異人」<sup>29</sup>之國。

以永井繁子（1862~1928）、津田梅子（1864~1929）為例。

永井繁子（後改夫姓為瓜生繁子）<sup>30</sup>是江戶本鄉猿飴橫町（今東京文京區）

<sup>26</sup> 岩崎京子：《少女たちの明治維新：日本で最初の女子留学生たち》（京都：PHP 研究所，1983 年）。

<sup>27</sup> 湯澤雍彥監修：《日本婦人問題資料集成・第 5 卷・家族制度》（ドレス出版，1976 年，頁 348—349）。

<sup>28</sup> 大久保利謙：《森有禮全集》第 1 卷（東京：宣文堂書店，1972 年，頁 611）。

<sup>29</sup> 當時日本一般民眾對西方所知尚不多，也還充滿對「異鄉」、「異人」的可怖可畏之情。

<sup>30</sup> 永井繁子外孫女曾為她作傳。參見生田澄江：《舞踏への勧誘—日本最初の女子留学生永井繁子の生涯》（東京：文藝社，2003 年）。

出身，行四，生父是佐渡奉行屬役益田孝義，但由幕府軍醫永井久太郎收為養女。10歲隨岩倉使節團由橫濱出發、橫越太平洋後，在加州登陸，走鐵路抵達美國首都華盛頓。永井繁子被安排在 New Haven 近郊的家庭寄宿與就讀，小學、中學畢業後，升入 Vassar College 音樂科，3年後取得學士學位(Bachelor of Arts)。

永井於 1881 年學成返國時，召開日本有史以來第一場鋼琴獨奏會<sup>31</sup>。雖然她已經完全無法以日語言語，但依然以高薪獲聘到東京音樂學校（今東京藝術大學音樂科）教授音樂，及女子高等師範學校（今御茶の水女子大學）教授英語，同時獲聘到文部省新設的「音樂指導組」，協助將西洋音樂移植到日本的音樂教育中。同時，永井與在美國相識的青年將官瓜生外吉（後擔任日本海軍大將）結褵，生育 7 名子女，家庭和樂幸福，退休後夫妻倆為了修復美日關係而努力不懈，可惜因癌症於 1928 年以 67 歲之齡病逝。

而在留美少女中年齡最小的津田梅子（初名むめ，1902 年改漢字名梅子），出身東京士族之家，是津田仙（舊江戶幕府幕臣，曾擔任翻譯官赴美，維新後創設「勞農社農學校」，推廣西方蔬菜栽培，可說是農業界的啟蒙家）的次女。抵美後被安排在華盛頓近郊親日的日本公使館書記官 Charles Laymen 家住讀，十分受到寵愛，成績也十分優異，特別是數學、物理、天文、拉丁語、法語成績居冠<sup>32</sup>。留美生活期間，她開始萌生信奉基督教的思想，在 1873 年受了洗成為了教徒。在 Georgetown Collegiate Institute 畢業後，進入了私立女子學校 The Archer Institute 繼續進修拉丁語及法語語學、英語文學、自然科學、心理學、以及藝術。

1881 年當初建議明治政府選派少女留美的北海道開拓使黑田清隆發出歸國命令，但由於津田梅子尚在學，遂由一同赴美的山川捨松為之提出延長申請，最終翌年畢業後返國。

去國離鄉 12 年，津田回國後面對很大的適應問題，津田梅子幾乎忘記如何說日語，且深刻感受到西方和日本之間在對待女性地位的落差，即使面對她相較已算是西化的父親，仍感覺到強烈的傳統男尊女卑的觀念。她返國後先成為伊藤博文子女的家教老師，1885 年又在專供貴族女兒就讀的學校——學習院女學部——擔任英語教師。貴族女子學校的教學宗旨是教育學生成為順服的賢妻良母，而非學習知識充實自己，讓她非常不能認同，產生再度赴美的念頭。

1889 年她獲得校長西村茂樹的兩年間留學許可，因為熱衷於研究達爾文的進化論，於是選擇進入賓州的 Bryn Mawr College 主修生物學及教育課程，在生物學方面她發表的論文〈蛙卵的產生〉很受矚目，在教育學方面她特別留心於教育方法的研究。同時，她希望落實協助其他日本女性出國留學的念頭，公開提供八千元，作為女性出國留學的資助。

1892 年回國，在華族女學校復職，也執起東京女高師的教鞭。她注意到明治政府在 1889 年發佈的女子教育法，雖然確保了各府縣須設立一所女子高中，

<sup>31</sup> 遠藤宏：《明治音樂史考》（東京：有朋堂，1948 年）。

<sup>32</sup> 飯野正子、龜田昴子、高橋裕子編：《津田梅子を支えた人びと》（東京：有斐閣，2000 年）。

卻有種種干預而令女子高中的質素始終不及男子高中，於是發表許多公開言論，推動女子教學。1900年她在東京的麴町創立津田女子英學塾，提倡博雅教育，為女性提供公平受教的機會<sup>33</sup>。

可惜由於津田梅子為了籌款等等，在津田英學塾工作負出太多心力，導致身體日漸衰弱。1919年返回鎌倉的別莊休養卻始終未曾病癒，1929年逝世，享年64歲。她去世後，女子英學塾易名為津田英學塾（1933）、津田塾專門學校（1943），1948年升格為津田塾大學。她終生未婚，將全副心力奉獻於女子高等教育，試圖提升女子的社會地位。不過由於她不支持女權主義，認為教育應當著眼於提升知識水準及個人修養，而非積極參與政治事務，所以和爭取婦女參政權者，態度上有所不同。

而在中國，就在留美幼童奉命回國的1881年，出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位女留學生——金雅妹（1864~1934）<sup>34</sup>。

金雅妹（一作金韻梅）<sup>35</sup>是寧波人，父親為當地教會牧師，可惜在她3歲時父母皆染疫雙亡，由寧波長老會麥加梯博士（Dr. McCartee）<sup>36</sup>收為義女。1870年麥加梯博士前往中國駐日本公使館協助處理事務，金雅妹同行，成了中國第一位留日女學生，接受良好的中等教育。在此基礎上，1881年又赴美國攻讀醫學，是中國第一位留美女學生。1885年以第一名成績畢業於紐約醫院附屬女子醫學院（Women's Medical College of the New York Infirmary），是中國第一位女大學畢業生。

此後金雅妹繼續在美研究實習，先後供職於費城、華盛頓和紐約等地的醫院，也曾在《紐約醫學雜誌》（*The New York Medical Magazine*, 1814-1815）發表〈組織學的顯微攝影（The Photomicrography of Histological Subject）〉一文，探討顯微鏡技術，引起了美國醫學界的關注。

1888年返國，先在廈門從事教會系統的醫務工作。翌年因患瘧疾赴日本求治，1905年回國到成都。受蔡元培等人1906年起提倡女學之惠，於1907年獲

<sup>33</sup> Furuki Yoshiko. *The White Plum: A Biography of Ume Tsuda: Pioneer in the Higher Education of Japanese Women*. Weatherhill 1991; Rose, Barbara. *Tsuda Umeko and Women's Education in Japa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2. 大庭みな子《津田梅子》（東京：朝日新聞社，1990年）。

<sup>34</sup> 關於金雅妹的資料最早見於1934年的《東方雜誌》（第31卷11號），2000年出版的《中國醫學通史》近代卷第九章「醫學人物」也有刊載她的資料。

<sup>35</sup> 《天津通志·科學技術志》中又作金雅梅。

<sup>36</sup> 麥加梯（Dovie Bethune McCartee, 1820-1900），生於紐約，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與賓州大學。終身為傳教士。1843年前往中國傳教，除學習中文、行醫，也替寧波美國領事館工作，並擔任上海「會審公廨（mixed court）」評審員。1861年，曾入南京與太平天國「天王」會晤，獲洪秀全召令一封，保證在華美國傳教士及其信眾（不分中外）皆免於太平天國迫害。1872年，在他建議和勸說下，一艘航行於北京與東京之間的祕魯籍船隻，釋放了船上所有苦力，令他們成為自由的人。麥卡梯博士因此擔任起他們的祕書與翻譯。從1872年十月到1877年四月，麥卡梯博士都待在日本，擔任東京帝國大學教授，同時仍為中國駐日本公使館工作。1880年返回美國，1882年為中國移民事務前往夏威夷。1885年，他擔任日本駐美國公使館祕書，留駐華盛頓。1887年返回中國和日本。麥卡梯著作甚豐，舉凡亞洲歷史、語言、自然科學、醫學、政治等，皆有著作。參見 <http://www.famousamericans.net/robertmccartee/>。



任命為北洋女醫院（原名「北洋女醫局」，今「水閣醫院」）院長。1907年得直隸總督袁世凱助銀2萬兩而創辦醫院附屬護士學堂，培養護士人才。她擔任醫院院長年任內，成為那個時代最負盛名的女大夫。1915年因公赴美。回國後退休，擇居北平。1934年因肺炎不治，病逝於協和醫院，享年70歲。

金雅妹終身未婚，交遊甚廣，也參與許多社團活動，關注社會問題，熱心於教育事業和農村衛生事業。曾捐款3000大洋協助北平國立第一助產學校校長楊崇瑞博士在清河鎮建立助產學校<sup>37</sup>，又捐款15000元給燕京大學當作建校基金<sup>38</sup>，可見其熱心公益及教育。

繼金雅妹之後，福州女子何金英於1884年在福州教會醫院的資助下赴美國留學，1892年江西女子康愛德和湖北女子石美玉也在傳教士的資助下赴美留學。

何金英（一說為吳金英）<sup>39</sup>之父是教會人士，思想比較開明，曾堅決反對其母為她纏足，思想在當時可說相當先進。何金英少年先在福州的教會女塾讀書，卻嫌女塾的功課過於呆板，轉到福州婦女醫院學醫。她對學醫興趣極大，她的聰穎和熱忱也被醫院院長看重，於是請求美國的婦女傳道部（Women's Foreign Mission Society）<sup>40</sup>出資，傳教士帶她赴美。

她先在費城Dr. Sites家中學習一學期英文，考入俄亥俄衛斯里昂大學（Wesleyan University）<sup>41</sup>。1888年大學畢業，入費城女子醫科大學（Female Medical College of Pennsylvania）<sup>42</sup>習醫，1894年畢業，因中日甲午戰爭爆發而留在美國實習一年。翌年返國服務於福州婦孺醫院（後名柴井醫院，今福州市第一醫院），隨後並接下院長工作。1898年受李鴻章派遣，赴倫敦出席世界婦女協會（International Women's Congress），是中國在國際上的第一位女代表。1899年主持福州馬高愛醫院（Woolstone Memorial Hospital，後名協和醫院），1929年因病去世，享年54歲。

---

<sup>37</sup> 《文史資料選編》第30輯（1986年）。

<sup>38</sup> 參見劍虹評論網「讀經沙龍」〈司徒雷登與燕京大學〉一文，

<http://www.sciencetimes.com.cn/col36/col75/article.html?id=34917>

<sup>39</sup> 何金英生平資料可參見馬庚存：《中國近代婦女史》（山東：青島出版社，1995年）。

<sup>40</sup> 1904年起北美浸禮會婦女傳道部便開始派遣女傳教士來華，專門執行婦女傳教和教會女子學校工作（過去由傳教士的妻子代行婦女工作）。也陸續培養了中國女傳道士和女護士。

<sup>41</sup> 創立於1842年，由聯合衛理公會（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主持，早期被視為「西方傳教士培育中心（West point of Mission）」，因其學生畢業後多以傳教士身份到海外服務，或熱衷於投身和平志願隊（Peace Corps volunteers）※（見下註）。學風嚴謹，根據國家研究委員的調查，在1920年代以前，是出產最多博士的大學之一。（參見<http://www.owu.edu/about.html#history>）。

<sup>42</sup> 現為賓州醫學院（Medical College of Pennsylvania），設於1850年，原名賓州女子醫科大學（Female Medical College of Pennsylvania），1867年改為Woman's Medical College of Pennsylvania，1970年改為今賓州醫學院，是世界第一所女子醫學院。1970年開始招收男學生。本院1993年與Hahnemann University合併，成為MCP Hahnemann University。2002年再被Drexel University接管，成為德克索醫學院（Drexel College of Medicine）。（參見：<http://www.factmonster.com/ce6/society/A0832457.html>）。



## 六、異域、跨界、認同

概觀了十九世紀中、後期到二十世紀初，中日兩國由私費、公費、公派而遠渡重洋留學美國、英國、德國的男女留學生。他們見證了滿清帝國到中華民國、幕藩體制到天皇政治的朝代遞嬗，以及相隨而來的思潮激變。作為第一批離脫母國傳統，親炙西方文明的東方人，有研究者以「邊緣人」來定位他們，意即處於兩種文化交界，遠離某一文化中心，在認同另一文明形態的同時，身處的現實環境又不斷提醒其本土背景，因此在文化歸屬感上出現兩歧性，既完全接受另一種文化，民族情感又越發強烈。外在環境由習慣轉未知、傳統而創新，個人處境則被推向「邊緣」，跨界到異域的體驗，產生內在對自我和他者認知、認同的模糊。「邊緣」帶有反社會、或為社會所反的意思，同時也具備「有別於主流」、「另類」的意思。他們同時也是「夾縫」之人——處在東方和西方的夾縫中、前近代和近代的夾縫中、宗教和家國認同的夾縫中、公意與私情的夾縫中。「夾縫」有如一個臨界位置，兩界互交，製造了夾縫的存在空間。當介入兩種有衝突和對立的文化時，在價值觀或行為矩範上產生隔膜，在兩種文化的磨擦下也遭受情感折磨。

他們之中的數位，由於出國前年紀太小，本國語言根底有限，本國文化了解甚少，致使出現留學生們回國後首先遭遇本國語言文化的逆衝擊現象。例如津田梅子在留美 11 年回國後，和家人說話也要通過翻譯，拜訪友人時則對日本特有的接待禮儀不知所措。永井繁子終其一生，無論寫信還是看報，幾乎都使用英文。新島襄回國後維持著美國生活習慣，認定美國是心之故鄉，他在京都建造了日洋折衷的房舍，遺囑以英文撰寫。容閔則娶美籍妻子，終老在美國。這些舉措當然都顯示了一定程度的文化和情感認同。

但從另一角度看，他們的「出走」和「回歸」，都是經過深思熟慮、自覺自願，帶著明確的使命感。他們希望將祖國由封建或落後之境提升到能與西方並駕齊驅，帶著反對封建、改變專制閉鎖的目的回國。要是沒抱持對家國足夠的熱愛，他們不會明知「邊緣」、「夾縫」的處境而堅持回鄉。但是異域和跨界的經歷讓他們歸國後像個孤獨的夾縫人般，不輕易見容於本土同胞，反而經常遭遇到不屑、懷疑、敵意或排斥。

關於早期留學生的留學國，在十九世紀七十年代，英國最為強大，對清政府的影響也最大，而英國人赫德又長期擔任中國海關的總稅務司，對清政府的外交活動常有建議，包括 1867 年支持美國卸任公使蒲安臣出任清政府出使大臣等。但曾國藩等人並未建議朝廷把幼童派往英國留學，而是選擇了美國。沒有資料顯示曾國藩等人建議朝廷把幼童派往美國的具體原因，這恐怕不是因為曾國藩等人認為美國的軍事以及學術水平最優，最適合中國的國情。很可能是由於容閔親身在美國學習並畢業，對美國頗具好感，積極向曾國藩等人推薦的結果。考慮到容

閔和曾國藩、丁日昌等洋務大僚的私人關係，可以認為容閔的建議是使幼童留美而不是留英的直接原因，而《中美續增條約》的有關規定則起到了決定性作用。清廷第一次派遣留學生，並不看重留學國的選擇，顯示出某種盲目性，當然在以後派遣船政留學生赴英法學習時，這些不足得到了改正。

就日本而言，在普法戰爭（1870）後，日本認識到德國軍制的優越，曾經三任內閣首相的桂太郎當時正要去法國巴黎留學，聽聞法國慘敗，立即從倫敦出發，將留學地轉為德國柏林。而 1881 年度開始，日本文部省留學生主要前往德國留學，所學專業已經不限於軍事，又擴展到機械、動物、醫學、政治等學科，反映了文部省與日本學界對德國在教育科學文化上的迅速發展給予認同。

此外，清廷對公費留學生的管制嚴格，日本則不然。清廷公費生出洋時長袍馬褂，頭戴瓜皮帽，腳穿白布襪，足登白底黑布鞋，腦後拖著一條辮子，一副標準的中國官僚士大夫正裝<sup>43</sup>。政府不容許他們在衣著上發生變化，認為這代表離經叛道，是以孝治天下的哲學理念在美國等強勢文化面前的崩潰。但考察日本近代留學史，包括 1862 年日本第一批留學生，並未發現日本官方在留學生服裝和髮型上有過任何規定，幕府內部似乎並未有過爭論。這也許是幕府方面認為，剪髮易服遠遠不如盡快解決國內外危機來得重要，也可能是日本並未把服裝認定為與國家意識形態息息相關。

由人物勾勒出來的中、日留學生史，把他們各各的生命歷程放在西化史、留洋學史上看，印證了近代中國所背負的極具抑製作用的傳統思想文化包袱，遠比曾經接受過中國傳統思想文化影響的日本要沉重得多，因而向歐美學習的步履也就艱難緩慢得多。

---

<sup>43</sup> 幼童之一溫秉忠在回憶他們出國時的衣著時說：「出國前夕，每位學生發給鋪蓋一床及小箱子一隻，內有長袍馬褂。」第一批幼童 1872 年在香港的合影，極為清晰，可以看出留美幼童正裝的每一個細節，而 1878 年攝於美國的照片，上有詹天佑和梁敦彥，他們的衣著、神態和氣質，和 1872 年的合影反差極大，令人驚訝。